



ZHEJIANG GAIGE KAIFANG SANSHI NIAN YANJIU XILIE LILUN PIAN

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研究系列
理论篇

主体维度论 浙江党建实证研究

胡承槐 王侃 邱巍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研究系列·理论篇

主体维度论

浙江党建实证研究

王侃 邱巍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主体维度论:浙江党建实证研究 / 胡承槐,王侃,邱巍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11

(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研究系列·理论篇)

ISBN 978-7-308-06362-3

I. 主… II. ①胡…②王…③邱… III. 中国共产党—基
层组织—党的建设—研究—浙江省 IV. D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0526 号

主体维度论:浙江党建实证研究

胡承槐 王侃 邱巍 著

出品人 傅强

丛书策划 徐有智

丛书主持 袁亚春 王长刚

责任编辑 张明

封面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0571—88925592,88273066(传真)

排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4

字数 251千

版印次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06362-3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 任	赵洪祝			
副主任	夏宝龙	王国平	巴音朝鲁	李 强
	黄坤明	郑继伟	张 曦	
成 员	胡庆国	马林云	陈一新	胡 坚
	金兴盛	刘希平	钱巨炎	乐益民
	杨建新	钟桂松	陈 荣	林吕建
	郑仓元	童 健	胡祖光	梅新林
	许 江	邵占维	张金如	陈德荣
	孙文友	徐止平	孙建国	梁黎明
	张鸿铭	陈荣高		

“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研究”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黄坤明			
副主任	沈立江	陈永昊	胡 坚	陈 荣
成 员	舒国增	陈一新	顾益康	姚先国
	史晋川	马力宏	盛世豪	朱家良
	葛立成	毛 丹	汪俊昌	曾 骅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陈平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

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研究系列·理论篇

30年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

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序

赵洪祝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

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 10 余个系列 400 余项研究课题,完成 230 项课题研究,出版 200 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2008 年 6 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

2008 年 9 月 10 日于杭州

前言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浙江省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从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跃升为“走在全国前列”。其奥秘何在?本书的任务是从浙江地方党的活动和建设层面上探寻具有普遍意义的浙江特殊经验。

将浙江地方党的活动和建设的经验归结为始终坚持主体性维度、始终坚持尊重人民和党员的主体地位,亦即党建主体论,这是本书作者对浙江地方党的活动和建设的独特理解。所谓党建主体论,包含以下几层意思:首先是指党的建设、党的活动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皈依地,一切都是为着人民而着想;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指党相信人民的主体力量,放手引导人民自己成为自我主体,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思想活动的主体、日常生活的主体乃至局部政治生活的主体;最后,是指党的政策改革和制度供给旨在以人民成为主体为维度,旨在为人民展现、实现自己的主体性而搭建政策和制度平台、制度通道。之所以作这样的概括,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首先,党的建设这一范畴其外延有多大?20世纪80—90年代通常被规定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三大方面,21世纪以来,许多理论工作者及党建工作工作者则倾向于认为在列举上述三大方面之后,还应包括制度建设。本文作者则以为党的建设范畴的外延,还需进一步拓展,因为仅有上述四个方面的简单列举,仍难以说明30年来党的进步,难以描述党在这30年的实际样态,更难以描述浙江何以能够“走在全国前列”。因为,作为执政党来说,其最主要的存在和活动,是执政、是政治领导、是意识形态引领、是政策和制度供给。总结和提炼党的建设经验,最为核心和首要的任务,是要总结党的领导活动和执政活动的经验。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党的执政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联结的辩证关系。党的建设的成果最终体现为党的领导活动和执政活动的改进才是有意义的、富于成效的建设。党的建设是因,党的生命力的加强、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是果。

可问题在于:当我们将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活动、党的执政活动联结起来思考问题时,党的建设活动的外延随之亦就扩张了:党的建设不仅包括党

本身内部的、有形的、可用文字来描述的抽象活动,还包括那些大量党向外发散的、无形的、感性的、无法用文字概括的实际活动。在这里,党本身内部的有形的党建活动,主要指那些由党的相关组织布置、安排和组织的关于党自身建设的活动,如整党、如先进性教育、如民主选举党的干部;党向外发散的无形的党的建设,则指并非由党的有关组织安排的活动,而是由党与社会互动所产生的党的状况的改进,如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的转变及政策和制度供给水平的提高、党的活动方式的转变,等等。犹如人的身体素质的增强,可由有形的体育锻炼得以提高,亦可能是因为无形的休息(相对于锻炼而言)得以改善,还可以因外部环境(土壤、空气、水、食物成分)的改变而提高。同理,党的活力的增强和领导水平、执政水平的提高,虽有赖于有形的党的建设活动,但更多地却是有赖于无形的党的建设活动,如党与社会各界群众的互动。无形的党的建设,是潜藏于党的每一个成员全部主观的意识活动和行为方式之中,潜藏于党、党的成员与社会公众的互动关系之中。进而,从这一视角来说,我们将党的建设仅仅归结为党自身内部建设的几个有形方面是不够的,而应扩展到党的全部活动中去,用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和命题来加以概括。而主体、主体性概念,及坚持主体性维度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概念和命题。这是因为,第一,主体性概念是一个抽象程度最高的范畴,其外延涵盖面广泛;第二,从终极的意义上讲,我们可将党的建设问题归结为主体和主体性的构建问题,直接地可归结为每一个党员的主体性问题,间接地可归结为社会公众或说人民的主体性问题。^①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两大互相关联的逻辑分析方法。一是社会结构分析法。在这一分析方法中,马克思强调社会结构的层次性和层次的递进关系,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的优先性、强制性;二是主体—客体分析法。在这一分析方法中,马克思强调主体对客体(社会关系及其定格即社会结构)在价值层面上的优先性和客体“为人”的从属性,强调客体的派生性即社会关系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形式。综合这两大分析方法,则可窥见:(1)当马克思在考察个体主体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时,个体更多的是表现出他的被动性,个体的能动性的获得则更多地取决于社会结构对个人的强制性程度。(2)当将

^① 人民的主体性之所以与党的建设相关联,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而人民创造历史又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背景下进行的。党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政策供给在当代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程度。从这个层面讲,提升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程度,既是党的建设的终极目标又是检验党的建设有无成效的标尺。其二,党是怎样的,既取决于党内部的各种要素的内在构成,同时亦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整体状况,尤其是取决于广大民众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的实际情况。人民主体地位和主体性程度的提高,是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前提、基础和内在要素。

主体设定(在现实中表现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为个体的集合(如整个阶级、社会)时,主体则上升为能动的主体,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不过是主体活动的外化、对象化形式,是主体性得以实现的具体路径。(3)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在本质上是主体觉悟和生成的过程,是主体(不论从个体的层面还是集体的层面上讲)性不断提升的过程。

运用唯物史观方法理解 and 考察党的活动及党和党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可推导出以下几点:(1)党作为一个组织形态,是党员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主体意志而构建起来的客体形式,党员是主体,党是客体。在这个层面上,正确的说法是党要听党员们的召唤,是党的一切活动要有利于党员主体性的提升和实现,而不是相反。(2)党员个体主体的展现与实现是在众多党员意志的集合中实现的,进而党员主体性的实现转换为扬弃自身个体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在这扬弃的过程中,党员的集合意志、党的组织表现出对党员个体的强制性外观。从这一层面上讲,党员个体的意志要服从党和党的组织的意志。(3)党的生命力和活力取决于党的个体的生命力和活力,取决于党员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党员个体性主体的存在和发挥,这种空间越大,党员的主体性越是容易得以发挥和实现,党的生命力和活力就越是旺盛。(4)与个人和社会之间存在双重的社会化过程(身份角色的社会化和行为的社会化)相类似,党员个体与党之间亦存在双重的组织化过程:身份角色的组织化和意志行为的组织化。这是两种方向相反、作用力相反的组织化过程。在前一个组织化过程中,强调的是身份角色,其力量传导过程由上到下,其基本原则是个体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在后一个组织化过程中,强调的是个体意志如何走向集合,其力量传导过程由下向上,其基本原则是主体意志的体现(或者说党内民主)。前一个组织化程度越高,则意味着个体的能动性越弱;后一个组织化程度越高,则意味着个体意志与集体意志的一致性程度越高,个体能动性程度越高,但是包含着效率水平低的风险。这是一对巨大的矛盾。由这一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所决定,产生出党的组织内部的第三大关系即党员群众与党的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关系。由身份角色组织化所决定,在组织中,任何党员个体都被客体化、原子化,党员群众服从于党的领导干部,党的下级干部服从于党的上级干部,本质上是党的组织结构各单元之间权力传导的人格化表现;反之,在意志集合的组织化过程中,每一个党员的人格意志是平等的,从理论逻辑的原则高度上讲并不存在领导与服从的关系,在这里,党员的主体性复活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种组织化过程并不总是平衡的,在现实生活中,身份角色的组织化程度往往高过意志集合的组织化程度,尤其是后一个组织化程度很低而前一个组织化程度很高的时候,党员的主体性将丧

失殆尽,这时党的生命力亦就衰退了,甚至开始异化了。由此可见,如何防止党员主体性的衰退,或者说如何提升党员主体性的发挥和实现程度,是党能否保证自身“先锋队”性质不变,始终保持生命力和提升领导水平、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

再次,从经验总结的切入点和文本叙述简明性要求的角度来说,有四大因素推动着我们从主体性的视角出发来概括浙江地方党的30年党建经验。

其一,虽然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要求逻辑遵循历史真实,但逻辑的展开过程并不等于历史现象的面面俱到和时间循序的平铺直叙,而必须透过丰富、庞杂的历史现象找出贯穿于30年来浙江地方党的活动和建设的轴心,并以此为文本叙述的脉络铺排和编辑30年来浙江地方党的活动和建设的具体历史进程。换言之,关于浙江省30年来党的建设经验总结所提炼概括的内容必须是核心性的、一以贯之的。

其二,浙江地方党的建设经验总结,课题本身就要求着文本叙述的主题要富于浙江特色,其提炼归纳的内容要具有我有人无,或我做得好、做得早、做得快的特征,依据这样的要求,总结浙江地方党的建设经验必须超出全国统一部署推开的党建活动层面,如“三讲活动”、“先进性”教育,等等,并深入到浙江地方党的活动和建设所特有的层面。

其三,与全国各地一样,浙江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在党中央和地方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而浙江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位列全国中下游到“走在全国前列”,则是与浙江地方党的活动和建设的独特性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们总结和归纳浙江地方党30年来党的活动和建设的经验,必须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动因相联系,必须将对党的活动和建设经验的总结放在领导、推动、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层面上来考察,而不能将党的活动和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分割开来,理解为“两张皮”。也就是说,关于浙江地方党的活动和建设经验所概括的内容与浙江地方经验和社会发展的经验内容二者必定是相通的、兼容的,而不是对峙的、排异的。

其四,历史是连续的,过往的30年对今后深化改革开放有着深刻的影响。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目的是为指导下一阶段的改革开放提供历史启示和理论指导。换言之,关于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地方党的活动和建设的经验总结,其所概括的内容,既是过去30年的历史写照,同时又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矛盾、实际问题而给出的历史启示,内含着面向历史、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三大基本要素。

第四,如果说决定本书作者从主体性视角出发考察和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地方党的活动和经验,在客观层面、研究对象层面上是出于上述三

个方面的考虑,那么选择主体性视角,在主观层面上却是源于作者对主体性范畴的追求和对主体性方法论的崇敬。作者深为党的十七大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命题欢欣鼓舞。认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这一命题,不仅为发展党内民主提供理论基点,而且这一命题对全部党的活动和建设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指导意义。主体地位范畴是主体、主体性这一哲学认识论范畴在政治学中的转借,其现代政治学意蕴在于揭示了:人性是政治的基础;^①常识是政治规则的基本元素;^②而人民则是政治舞台的众多角色和观众。从主体性的角度看现代政治则可说,凡是合乎主体性要求的,政治就昌明、社会便发展,反之,政治就黑暗、社会便停滞。当将主体地位与党的建设连接起来思考党的建设时,实际上已为认知、评价浙江30年来党的建设和党的活动历程确立了一个新的基本维度。

从主体、主体地位的视角认识和理解党的活动和建设,其长处在于将在传统的党的学说的认知方式下长期被遮蔽或忽略了的主客体关系问题,党员乃至人民群众在党的活动和建设过程中的地位问题以及执政党的制度供给、政策供给的价值指向问题凸显了出来。

首先,从主体、主体地位的视角认知和理解党的活动和建设,为我们重新确立了人民群众和党员对党的主体地位,亦即在本体论层面,相对于人民、相对于党员来讲,党是客体,党是为着人民群众(包括党员)的利益的工具系统,而不是相反地将人民和党员理解为实现抽象教条和理念的工具。在党与人民、党与党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改革开放前“左”的教条主义观念(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将人民和党员仅仅理解为为了实现教条主义化了的空想社会主义理念的工具,而不理解为社会主义是人民(包括党员)为了实现自身根本利益的观念反映和重建社会关系的制度要求的主体。换言之,以主体地位为维度,亦即要求党的活动和建设要以人性及党的人民性为基础,以常识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准则。

其次,从主体、主体地位的视角认知和理解党的活动和建设,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和党员是党的力量源泉,明确了人民(包括党员)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体力量,进一步明确了党要遵从人民和党员的意志,而不是党将人民和党员理解为自己的驯服工具;党不是因为人民或党员的服从才有力量,恰恰相反,

① 在前现代的传统政治意识中,政治被神秘化,政治被界定为脱离人性甚至与人性相对立的超物质存在。这种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将政治与人们的物质生活、经济过程分割并且对立起来,“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最为极端的论调要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所谓“物质生活富裕了,思想就会变‘修’”等耸人听闻的说法。

② 前现代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无视真、善、美的基本逻辑,无视常识的基本准则,是特权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童话《皇帝的新衣》可说是对这种背离常识的特权政治最为辛辣和形象的嘲讽。

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党体现了人民(包括党员)的意志,遵从了人民和党员的意志意愿。

最后,从主体、主体地位的视角认知和理解党的活动和建设,界定了未来进一步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行进路径,明确了党的意识形态引领、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的大方向、大原则,以及增进党群关系的具体抓手和切入点。

依据以上关于主体、主体地位维度的界定,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地方党的建设历程,我们认为浙江党建的最大亮点就在于:地方党总是依据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特征,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动或被动地坚持以人民的主体地位、党员的主体地位为基本维度推进自己的活动和自我建设,尤其是在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政策供给层面敢为全国先,解放、保护和激发全省人民发家致富、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权益要求和主体能动性,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和落实,保障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保障了人民各项政治、经济、社会和民生权利的落实。

鉴于上述考虑,全书共安排九章。第一章是绪言,概论主体方法论的含义、意义及全书主要精神。第二章,讨论浙江地方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经验,着重叙述思想解放、地方党的意识形态引领对主体意识的生成,进而推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第三、四、五章着重讨论浙江地方党的政策、制度供给如何成就浙江人民尤其是农民成为自我主体,如何保障人民展现、实现自己的主体能动性。第六、七、八章则侧重于叙述浙江地方党的自身建设始终坚持主体性维度的基本经验。第九章主要讨论过去30年浙江地方党的活动和建设的经验、党建主体维度论对当前及今后党的活动、党的建设的启示和意义,阐述了我们关于诸如思想解放、党员主体地位的确立、党内权力与权利结构的改善等重大问题的一些看法。本书由胡承槐、王侃、邱巍共同撰写。全书的主旨由三位作者共同讨论而定,其中由胡承槐撰写第一、二、九章的初稿,王侃撰写第三、四、五章初稿,邱巍撰写第六、七、八章初稿。全书的统稿工作由胡承槐完成。

目 录

第一章 绪 言	1
一、主体方法论	1
(一)主体及主体性的基本含义	1
(二)主体方法论与党的活动和建设	3
二、思想建设的主体维度	5
三、政策和制度供给的主体维度	8
四、党的政治和组织建设的主体维度	13
第二章 打破思想教条 催生主体意识	19
一、承认“家庭”的主体地位,初步解放农村生产力	19
(一)破除怕“包”的思想顾虑,推进联产承包责任制	19
(二)承认“家庭”的主体地位,默认和鼓励个私经济	22
二、确立“利益及身、能力本位”的主体向度,推进公有经济改造	25
(一)汲取个私经济的思想资源,大力推进集体企业改造	25
(二)坚持“利益及身、能力本位”原则,推进国有经济改革	29
三、发展市场体系,构建主体自由活动空间	30
(一)计划体制与浙江区域性差异	30
(二)市场体系在温州自发兴起	32
(三)从自发走向自为,积极建设市场大省	34
第三章 创新农村农业制度 重塑农民主体地位	39
一、创新土地制度,还农民自主权	39
二、以农民利益为维度,创新各项涉农制度	45
(一)尊重农民的劳动付出,调整农村产品定价制度	45
(二)改革单一的粮食种植体制,鼓励发展多种经营	47

(三) 创新产品交换制度, 农民成为交换主体	49
三、终止人民公社制度, 拓展农民自主空间	52
四、统筹兼顾, 引导农民共同富裕	54
第四章 创新农村工业制度 构筑农民兴办工商的制度平台	60
一、突破农民姓“农”的制度限制, 支持发展农村工商业	60
二、鼓励发展农村非公经济, 形成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格局	64
三、突破城乡分割制度, 大力发展小城镇	70
第五章 制度供给全面创新 激发全社会的主体能动性	76
一、不断创新企业制度, 确立企业微观经济主体地位	76
(一) 扩大企业自主权, 企业主体意义悄然复苏	76
(二) 创新经营机制和产权制度, 确立企业主体地位	81
二、创新投资体制, 发挥全社会创业积极性	86
(一) 改革交通投资体制, 引导公路建设主体多元化	87
(二) 创新铁路投资体制, 建立铁路股份公司	89
(三) 改革空港投资体制, 引导民资建机场	90
(四) 创新水利体制, 推动全社会兴修水利	91
三、健全社会秩序, 保障人民权益	94
(一) 加强立法, 构建法律秩序	94
(二) 重建政党制度, 恢复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	96
(三) 打击犯罪, 恢复和健全社会秩序	98
(四) 加大法律制度供给, 保障市场秩序	101
(五) 构筑社会保障制度, 保证社会民生安全	103
第六章 坚持干部的主体性维度 推进干部队伍建设	108
一、组织路线的调整和干部主体性的解放	108
(一) 甄别干部, 净化干部队伍	109
(二) 平反冤假错案, 重树党的干部的尊严和威信	110
(三) 全面整党, 重建党的权威和形象	112
二、贯彻干部“四化”方针, 建设富于主体活力的干部队伍	114
(一) 打破终身制, 富于活力的中青年干部走上前台	114
(二) 坚持“四化”方针, 提升干部队伍主体性	117
(三) 大力建设后备干部队伍	120